

市场星报

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2.6.18
星期六 壬寅年五月二十
今日4版 第7946期

全国数字出版
转型示范单位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阅

WEEKLY 周刊

读



作为一个来自中华书局的编辑，徐卫东与读者对这个老牌出版机构从业者的普遍印象有一致的一面，即埋首纸堆，喜欢与文字较劲。

入行至今，徐卫东在中华书局已经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。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，徐卫东做过一百多种书，但却一直和一本书“缠斗不止”。回想起自己名字第一次被印上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那一年，这位当时的新人编辑感受到更多的是欣喜。徐卫东不会料到，这本已经问世24年的经典作品将在往后十多年中和他的编辑生涯紧密勾连在一起。

一个编辑与《万历十五年》 纠缠二十年



世界上没有完美的《万历十五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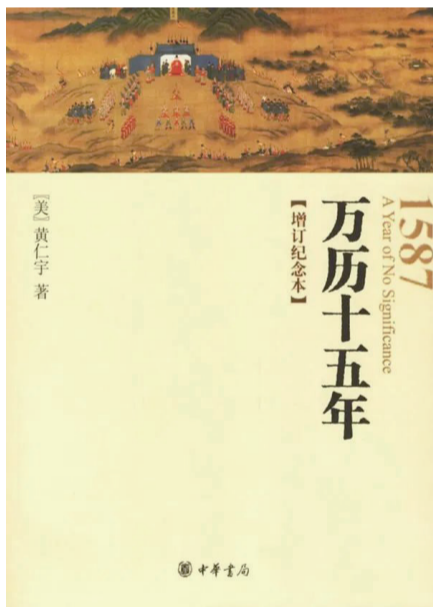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，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，徐卫东差点成了中学老师。至于最终并没有去教书的原因，他笑着说道：“因为我口音比较重，可能讲课不那么合适。”操着安徽桐城口音的徐卫东因此选择了另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，进入中华书局做一个编辑。此后便开始了他和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漫长缘分。

学历史的徐卫东很早就读过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。来书局工作后，徐卫东才第一次知道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简体中文版最早是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书局版本的销量大约只有三联书店版本的三分之一，徐卫东当年读的也是三联的版本。考虑到书局版本在市场上的落后局面，做一个新版本的想想法就此在徐卫东脑海中萌生。2004年，他向社里提出做《万历十五年》新版。

自2000年黄仁宇在美国逝世，中华书局和作者方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，书局版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版权合同也将于2004年底到期。徐卫东在网上搜索，竟让他找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邮箱。给对方发去邮件说明出版新版的计划后，等了8个多月才收到对方的回复，原来是将信发到黄培乐的旧邮箱去了。经过二十多封往来邮件的沟通，2006年2月初，新版的出版合同正式签订。自那时起，《万历十五年》每一个新版本的面世，对徐卫东而言都是一场“战事”。

按大部分读者的想法，黄仁宇是明史研究大家，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文版又经文史专家沈玉成润色，并由黄仁宇本人亲自审定稿件，理应是尽善尽美的。徐卫东却知道“实情并非如此”，比如将明清史学者“韦庆远”误为“卫庆远”，将海瑞临终所留银子数目由“十余两”误为“二十两”，类似内容上的错漏在1982年版《万历十五年》中并不少见，徐卫东通过核查中文史料（必要时参考英文版）将之一一修正。

经过两代编辑之手，2006年上市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（增订纪念本）应再无缺憾，



但徐卫东仍不敢这样想。“校书如落叶扫而愈有”，这版上市后，他还在不断发现书中没有改净的错漏。这些年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古籍数据库的完善，徐卫东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对书中文字包括史料来源深入查考核实，于是“核对引文，进一步提高编校质量”成为他在新版修订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，这一点也得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支持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虽然只有七章内容，字数也不到二十万，却引用了极其丰富的中文史料，每章所附注释少则数十，多至上百。编辑《万历十五年》（增订纪念本）时，徐卫东注意到网上有读者反馈海瑞是回族，1982年版中海瑞“竟然还买了两斤猪肉”可能有误。徐卫东于是翻出《明史·海瑞传》等核查，发现这些原始史料中关于海瑞为母贺寿这段的表述是“市肉两斤”或“买肉二斤”，“肉”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概念，指供食用的动物肉，的确不能说海瑞买的一定就是猪肉”，据此，他在增订纪念本中将“两斤猪肉”修订为“两斤肉”。



“当一本书能够一再重印，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”

从2006年新版选题计划提出的那一刻，徐卫东就开始了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推广历程。从基本的开本、版式、封面文案，到增收对《万历十五年》主旨有补充作用的文字、完成作者生前就希望为书中插入图片的心愿，徐卫东甚至请了三家设计工作室来为新版的封面设计样稿，目的是为区别于书局以往过于素净单一的书封。

增订纪念本的上市及其引发的一轮媒体报道热潮，显著促进了中华书局版《万历十五年》（含增订本）的销售，到2011年，从原来的年平均售出不到6千册增加至年均6万册。不仅如此，新版甚至激活了该书的整体市场，带动了三联版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销售，达到了徐卫东向设计师讲解封面设计要求时说的“让更多人知道它”这个目标。

大部分时候，徐卫东都认为做市场很难，而一本书的命运也不是编辑所能想象或决定的。

“有的时候你觉得能火，但就是火不起来，读者不认，或者没注意到，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一本书突然就火了。这里面不排除有运气的因素。”2017年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播出，徐卫东发现剧中提到了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不过因为提这本书的是一个反面角色，他心里没底，不知“是福是祸”，因此等了快两周才提出加印，而且每次加印量都不是很大，最多的一次才加了15万册，中间一度出现断货。那一年书局三个版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总计卖出了70万册，徐卫东估计三联版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应该超过100万册了，因此他对自己以及局里当时加印时的保守倾向感到有些后悔，“提到这个书的是反面角色，但不代表这个书不是好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应该胆子大一点，即使加多了也没关系，这书本来就是长销的畅销书”。

看到一些机构快速出书，似乎“做一本成一本”，徐卫东不无佩服，但作为编辑，他知道在少数畅销书的背后，是更多默默无闻的书。与其通过不停出版新书来提高图书畅销的几率，还不如下大力气发掘能稳定重印的好书。

“每年赶新书其实很累，实际上，出版社要利润的话，应该更多来自重印书，这才比较正常。”徐卫东二十多年来做的一百多本书中，每年能稳定加印的书大概有十多本，这些一再重印的书给了身为编辑的他最大的慰藉，“既然以编辑为一生的志业，当然希望能多编出几本好书流传下去，对吧？当一本书能够一再重印，那么在编校打磨过程中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了。”

据《出版人杂志》 谭皖予/文